

# 導言：中日在歷史互動中 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

❖ 吳偉明 ❖

自古以來，中國和日本就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雖然「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等老調並非客觀的學術陳述，卻多少反映中日兩國人民的主觀感情。<sup>1</sup>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

日本自古受中華文化薰陶，唐風興起，與和風互相輝映及融合。即使日人自隋唐以來積極吸納中國文化以開拓其現代性，但從未因此忘記自身的民族及文化認同。以修史為例，奈良前期朝廷差不多同一時間編纂了兩部史書：《古事記》(712)及《日本書紀》(720)。前者借用漢字作日文音標，內容充滿本土意識；後者用中文寫成，而且體裁、甚至故事多參考中國史籍。這種二元文化發展取向正代表了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似近還遠、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sup>2</sup>即使到了儒學、漢文及唐風大盛的德川時代(1603-1868)，儒者從未忘記日本人的身份，並努力將儒學本地化。<sup>3</sup>其實不少德川儒者同時也

是神道家，甚至明言或暗示儒學中心已東移日本。即使是做夢遇見中國三代聖賢以及講漢語要使用中國人口音的大儒荻生徂徠(1666-1728)也絕非忘本之中國崇拜者，他只是想借古代中國為德川日本所用而已。德川儒者對中國的感情十分複雜，多抱厚古薄今的態度，他們也許仰慕中國三代聖賢之遺風，但對眼前中國卻評價不高，甚至以滿清為夷狄入主的「他者」(other)。儒者兼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便蔑稱清朝為「支那」、「外朝」及「異朝」，認為日本才配稱「中華」及「中朝」。

近現代以降，時移勢易，主客互換，日本反過來成為中國尋找現代性(modernity)及身份認同(identity)時的重要參考。在兩國政治外交緊張，甚至兵戎相見之際，中國從日本引進現代語彙、制度、技術及思想。日本從昔日被中國人忽視的「蠻夷」或「倭人」，搖身一變成為可敬可畏的世界級強國。相反，對日本人而言，中國從以往的「上國」淪為「他者」，他們對中國形成「貴古賤今」的態度。<sup>4</sup>中國人的抗日意識及日本人的「支那批評論」都有助兩國建立及鞏固近代國家的意識形態。

近現代中日在互動中尋找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現代性是指在近代化(modernization)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的文化趨勢及價值取向。究竟如何將西方標準及本國傳統融合成為中日知識分子的共同關注課題。近現代日本經歷了從明治初期的熱衷西化，到明治後期的回歸日本及東亞傳統，直至戰後日本才尋找到適合將西方標準及本國傳統融合的歷史土壤。對中國人而言，在西方及中國模式外，還有日本模式可供參考。<sup>5</sup>近百年來中國在多方面尋找現代性時，日本總是陪伴左右。反日情緒無礙中國向日本取經的決心。清末民初，日本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模範，戰後中國經濟現代化多借助於日本，當今日本流行文化成為中國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參考。<sup>6</sup>

身份認同是指在近代化及全球化下的民族及文化認同，涉及在日本人、中國人、東亞人及地球人等錯綜複雜及重疊的身份中如何

取捨及決定優先次序。<sup>7</sup>在尋找自我( self )時，中日均不時以對方作為「鏡像自我」( looking glass self )，彼此十分在意對方對自己的看法，並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

現代性及身份認同是近現代東亞史上的兩大重要課題，對理解中日交流史很有啟發。承蒙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慷慨資助，我們在2010至2011年度結集北美、日本及中國兩岸三地的代表學者，組成十多人的跨國研究團隊，從事「從近現代日中文化交流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探索」( Searching for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Japan-China Cultural Flows in the Modern Period )的研究項目。本書跟一般中日交流史的論文集有所不同：第一，這不是傳統的歷史研究，而是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執筆者具有不同的學術背景，各自在擅長的領域撰文，從歷史、考古、思想、書法、教育、電影及流行文化等不同角度，探討近現代中日兩國如何在對方身上尋找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第二，這不是拉雜成書的論文集，而是有主題的研究成果，所有文章對瞭解近現代日中兩國的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均有啟發。第三，這不是單方面強調日本如何影響近現代中國的陳述，而是以中日歷史互動為切入點的分析。第四，本書非以專家同行為重要對象，而是針對廣大的大學生，希望加深他們對東亞歷史及文化的認識及興趣。

本研究在結構上分三大部分：文化交流篇、思想交流篇及政經交流篇。文化交流篇重新檢視近現代日本對中國的複雜情懷及從考古與流行文化之中反映的中日文化互動。明治日本的中國情懷十分複雜矛盾。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不少日本人對中國失去了昔日的敬意，儘量與其保持距離，甚至以它作為反面教材。<sup>8</sup>福澤諭吉( 1835-1901 )的「脫亞入歐論」及岡千仞( 1832-1914 )的「支那三毒論」( 經毒、煙毒及貪毒 )便是這種貶中態度的代表言論。支那批評論在明治文化人之間十分普遍，也可說成為當時一種主流的中國觀，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充實。明治日本其實有其傳統及親中一面，例如：漢

詩及漢學塾十分流行，明治領袖在做政治及軍事決定時會參考《易經》的占卜結果等等。<sup>9</sup>黃天、王寶平及王曉秋的論文讓我們窺見明治日本人在支那批評論以外的另一種中國情懷，書法家、漢學家及文人墨客對清末民初的中國同行依然尊敬有加，而且積極跟他們交流與學習。在書法及漢詩等傳統文藝上，中國仍未失去其指導者的角色。傅佛果( Joshua Fogel )的研究顯示中日相關的考古文物( 金印 )如何塑造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及學術的現代性格。從德川中葉至今，日本學界為金印的五字刻文如何解讀費盡思量。明治學界用文字訓詁帶出實証學風，透過解讀金印刻文重新思考作為日本人的意義何在。祖運輝及吳偉明則分別從電影及動漫審視身份認同及現代性的形成。戰後中國電影中日本人形象的變化反映出中國人在不同歷史階段尋找新的身份認同。從早年正邪分明的二分法到現在亦正亦邪的日本人形象，中國電影不但脫離泛政治化的權力支配，也反映中國人在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時，其關注從獨特性( particularity )過渡到普世共通性( universality )。日本人透過小說、漫畫、動畫及電子遊戲改造中國三國歷史，這種文化改造雖然引起中國一些文化原教旨主義者( cultural fundamentalist )的攻擊，但是從文化全球化( cultural globalization )的宏觀角度來看，這不但是日本人對中國傳統的致敬方式，更是一種將中國三國歷史據為已有的文化挪用( cultural appropriation )。

思想交流篇探討中日文化交流的主客互換現象。早於德川時代已有日人挑戰中國的華夷之辨及中華世界秩序，甚至認為日本才配稱「中朝」，才是繼承三皇五帝及周孔之道的地方。<sup>10</sup>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不但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盟主，在思想文化上也要爭取正統及優勢。沈薇薇、徐興慶及王海的論文，分別透過剖析大隈重信( 1836-1933 )、小室信介( 1852-1885 )及司馬遼太郎( 1923-1996 )的中國觀，明確反映明治以降日本人將日本取代中國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觀點。以大隈重信為例，其主張的「文明調和

論」是西洋文明及以日本為首的東方文明的調和，中國文明早已被邊緣化。對大隈來說，中國傳統的精華已被日本吸收，當今積弱的中國只有向日本及西方學習的份兒，而日本願作其「監護人」。小室信介西遊中國後，如很多明治時期訪中的日人般，在目睹晚清朝野的積習流弊後，對中態度從景仰變成蔑視。司馬遼太郎探索中國文明的本質，得出儒家思想鼓吹漢族中心主義因而阻礙了中國文明發展的觀點。對反對漢民族中心說及中華思想的司馬來說，東洋史去中國化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任達(Douglas Reynolds)及陳瑋芬的研究顯示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處處優於中國，學習日本成了中國邁向近代化的捷徑。任達探討翻譯西方著作與現代化的關係，指出近代中國人依靠日人翻譯的西方著作來吸收西方知識，其中以百科全書至為重要，有助於清末民初中國人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陳瑋芬比較近代中日女子教育，發現日本不論在理念及實踐上都優於中國。陶德民的文章讓我們明白日本人研究中國時背負的意識形態包袱及身份認同危機。究竟日本人閱讀漢文時是否需要像中國人般「直讀」(或「音讀」)?還是應該沿用日本行之已久的「訓讀」?這古老問題從德川至今一直糾纏使用漢語的日本人。<sup>11</sup>

政經交流篇將亦敵亦友的中日政經關係呈現在讀者眼前。日本改革政治及經濟的經驗成為近代中國的重要參考，日本人亦積極參與中國的政經活動。可是在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野心表露無遺，不斷加強對中國政經的控制。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跟日本人合作務必倍加小心，企圖在不損害民族尊嚴及利益的原則下，借助日本的經驗及實力，發展中國的政治與經濟。<sup>12</sup>換言之，就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借日本之力推動現代化，因此身份認同及現代性持續呈現緊張狀態。薄培林及貴志俊彥的文章分別論述吞併琉球及日本侵華的歷史。若前者代表日本挑戰中華帝國的秩序及周邊利益，後者則是在直接侵犯中國的主權及核心利益。歷史發展往往十分弔詭，中國向日本學習的時期正是日本侵犯中國的時期。村田雄

二郎、尤怡文(代表)及遲王明珠從立憲運動、教科書出版及銀行融資的角度來看近代中日政經交流的本質。張謇的立憲運動、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出版及上海申新紡織向日方的借貸都是中國借助日本之力開展現代化的例子，他們同樣因民族主義的衝擊而受挫折，可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兩者不時存在矛盾及緊張關係。

在全球化急速發展的今天，傳統以血緣、地域及習俗為依據的身份認同開始變得模糊，人們透過消費及生活風格(lifestyle)去尋找及釐定自己的身份。<sup>13</sup>現代性的定義亦從以往重視的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硬力量」(hard power)，擴大至傳媒、流行文化及價值觀等「軟力量」(soft power)。身份認同及現代性的概念需要重新詮釋。希望這個研究計劃能夠加深我們認識近現代中日兩國如何在歷史互動中互相影響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這只是一個開始，期待日後出現更多從跨學科角度對當下的中日交流作深入全面的調查分析。

本書的出版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資助，特此致謝。此外，對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編輯林穎博士及楊彥妮女士、香港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陸國榮博士、香港科技大學蘇基朗教授及我的研究助理鄧曜強先生在此書出版上提供的多方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 
- 1 有關「一衣帶水」的來源及其謬誤，參石曉軍著：《中日兩國相互認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7-11。陳舜臣對中日「同文同種」表示質疑，參陳舜臣著：《日本人と中国人：同文同種と思ひこむ危険》(日本人與中國人：迷信同文同種の危険)(東京：祥傳社，1971)。
  - 2 David Pollack, *The Fracture of Meaning: Japan's Synthesis of China from the Eighth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對此有精闢獨到的分析，特別是第一及第二章。
  - 3 Kate Wildman Nakai, "The Natur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okugawa

- Japan: The Problem of Sinocentr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1 (1980): 157–199.
- 4 Stefan Tanaka 討論近代日本如何建立其日本版東方主義，將中國作為他者，與它保持距離，甚至蔑稱之為「支那」。參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chapters 3, 6.
  - 5 不少清末民初的中國人重視日本模式，參 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及 Wai-ming Ng, "Zhang Jian & Nantong Project and the Meiji Japanese Model,"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16, No. 3 (2009), pp. 34–47.
  - 6 有關日本「軟力量」(soft power)對當今中國的衝擊，參 Utpal Vyas, *Soft Power in Japan-China Relations: State, Sub-state and Non-state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7 有關近代中日知識分子尋找身份認同，日本方面，參 Kenneth B.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國方面，參 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8 有關明治日人如何透過異化中國來建立民族認同，參 Urs Matthias Zachman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China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 1895-190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9 前者參 Margaret Mehl,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The Decline and Transformation of Kangaku Juku*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3)，及入谷仙介：《近代文としての明治漢詩》(東京：研文出版，2006)；後者參 Wai-ming Ng, "Divination and Meiji Politics: A Reading of Takashima Kaemon & Judgment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akashima Ekidan)," in Huang Chun-chieh and John Tucker, eds., *Dao Companion to Japanese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New York: Springer, forthcoming).
  - 10 W. G. Beasley, "The Edo Experienc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pp. 555–

566; Ronald Toby, "Contesting the Centr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Japa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7:3 (Taylor and Francis, August 1985), pp. 347–518.

- 11 雖然訓讀一直是主流，自荻生徂徠以來，一直有日人主張音讀。參太宰春台著：《倭讀要領》(1728)及岡田正三著：《漢文音讀論》(京都：政經書院，1932)。
- 12 近代中國未必一定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被動的受害者，反而不時把握機會發展現代化。See-heng Teow 研究二十世紀初中國如何與日方角力，企圖運用日本歸還的庚子賠款發展中國社會及文化事業，便是這方面的例子。參 See-heng Teow, *Japanese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 1918-193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